

“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脉络梳理与展望

陈勇兵 康吉红 王 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加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着重从微观企业层面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本文阐述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介绍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准模型和分析框架,对“新”新经济地理学经验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中发掘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视角的拓展、理论框架和模型方法的完善以及与相关研究领域的融合等。

关键词:“新”新经济地理学;企业异质性;集聚经济;城市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3)02-0003-08

一、引言

Krugman 在 1991 年开创性地将递增报酬与垄断竞争分析工具应用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1],从而成功地把空间概念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之中,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CP),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的诞生。这不仅使空间因素重新回归主流,也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异乎寻常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新经济地理学也因此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被视为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2]。在 20 世纪初,新经济地理学的 CP 模型与美国当时的经济地理比较吻合,从而很好地解释了 19 世纪美国制造业和欧洲的“热香蕉”(hot banana)地带的情形^[3]。然而,近年来,由于 CP 模型存在诸如对美国当今的一些经济现象并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其采用数字模拟的方法使得模型求解十分复杂、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等问题,使得 CP 模型受到一些人的批评^{[4][5](P35—43)}。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异质性对理解现实中贸易模式的重要性^{[6][7]}。Melitz 首先将企业异质性纳入到 Krugman 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中,其认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率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的厂商将退出该行业,生产率超过较高水平临界值的厂商选择出口并获利^[6]。在此基础上,Baldwin 和 Okubo 等学者将企业异质性引入新经济地理学中的 FC 模型(footloose capital

收稿日期:2013-01-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垄断竞争框架下进口贸易利得的测算及其在中国贸易实践中的应用研究”(712032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经济转型、FDI 偏好与国民福利”(10YJC790029)

作者简介:陈勇兵(1978—),男,湖南永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康吉红(1988—),女,湖北枣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

王 艳(1988—),女,河北保定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

model) 及 FE 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 分析了空间集聚及区位选择等问题^{[8][9]}。与加入企业异质性而形成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 NNTT)一样, Ottaviano 把引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10]。“新”新经济地理学着重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使得理论研究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运行情况,也对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如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有着重要启示。

鉴于此,本文首先阐述“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之后,从基准模型和理论进展两方面介绍“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演变。最后,从五个方面对“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进行梳理,从中发掘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将地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初期。早期学者的研究奠定了经济地理学的基础,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们的分析均是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之上,因而对现实经济并不能给予完全合理有效的解释。直到 1991 年,著名经济学家 Krugman 发表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开创性地把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分析工具应用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11],成功地把空间概念引入 D-S(Dixit-Stiglitz) 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复兴了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是在企业同质的情况下,探讨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如何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然而,针对新经济地理学存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考虑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集聚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Baldwin 和 Okubo 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以企业异质性与集聚经济为切入点,研究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的影响^{[8][9]},由此形成了融合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相关研究内容见表 1。

表 1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相关内容

理论名称	前提假设	代表性文献	主要结论	简要评价
古典区位理论	一个区域、区域均质、区位是外生变量、不考虑企业组织、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	Thunen (1826); Launhardt (1882); Launhardt (1885); Weber(1909)	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将网络规划应用于运输最优化和厂商成本最小化的定位问题;工业区位决定是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这些理论对经济地理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经济地理研究的基础; 2. 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分析,没有分析收益递增的市场结构; 3. 在方法上偏重静态分析,缺乏全视角的动态分析,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动态
新古典区位理论	区域均质、区位选择受竞争者的影响、不考虑企业组织、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	Christaller (1933); August Losch(1939); Ohlin(1933)	创建了静态的新古典框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分析区域结构;将贸易与区域问题结合,证实国际贸易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	
新贸易理论	对称区位、同质企业、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	Krugman (1979); Krugman(1980)	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效应;竞争效应	1. 引入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分析市场结构差异与贸易;2. 无法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对称区位、同质企业、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	Krugman (1979); Krugman(1991)	中心—外围结构;价格效应;竞争效应;内生的非对称性是突变性聚集、区位的黏性	1. 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对经济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2. 企业同质性假设掩盖了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
“新”新贸易理论	非对称区位、异质企业、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	Melitz(2003); BEJK (2003)	自选择效应;资源重置效应	异质性理论的引入为理解不同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模式提供了微观视角
“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非对称区位、异质企业、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	Baldwin 和 Okubo (2006);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	产业集聚效应;人才归类效应;市场选择效应	1. 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提供了分析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2. 对集聚经济的测定提出挑战

除了最初的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外,学者们也分析了在存在劳动者异质性时,企业的区位选择和集聚经济。Behrens 和 Robert-Nicoud 设定了一个垂直化城市差异的微观模型,将企业家管理才能异质性引入到模型分析中,首次在同一框架下分析了劳动者异质性、归类效应、选择效应影响下的集聚经济和城市经济^[11]。Okubo 的研究认为,企业异质性是一种集聚力,中心市场总是倾向于吸引高生产率企业迁入,并且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愿意迁移至中心市场;随着贸易成本下降,低效率企业在定位选择方面会更加自由,更加倾向于集聚;此外,企业异质性的存在更易导致不稳定的对称初始均衡,并最终导致完全集聚的出现^[9]。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

(一)“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准模型

为了更加清晰地阐释“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笔者借鉴 Ottaviano 的研究构建一个典型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10],并展示其逐渐演进为“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过程。

1. 由垄断模型向双寡头模型的演进

在单一企业的垄断分析框架下,假设有两个区位 H 和 F, H 区域拥有较大的本地产品市场以及较低的生产成本^①;F 区域拥有较小的本地产品市场以及较高的生产成本;两区域间存在交易成本。为简化分析,每个垄断企业只经营一个工厂。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作为单一的垄断企业,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在区域 H 不仅可以节省生产成本(节约成本吸引),而且其大部分产品可以通过满足本地需求从而达到节省运输成本的目的(寻求市场吸引),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较大的本地市场需求共同构成集聚力,因此企业通常会选择定位在区域 H。

然而,企业间的竞争效应会构成一种分散力,因而垄断的定位选择会由于竞争者的出现而变得复杂。因此,笔者通过添加一家竞争企业对简单垄断模型进行扩展。假设存在两个企业:企业 1 和 2,且企业 1 比企业 2 更具效率,两企业各自提供一种差异化产品,其他假设条件保持不变,那么双寡头企业将如何定位呢?在合理的条件下,两家企业在策略互动之后会产生两种均衡结果:一种是发生“集聚”,两企业共同定位在低成本、大需求市场的区域 H;另一种是发生“排序”,高效率企业 1 定位在低成本、大需求市场的区域 H,而企业 2 选择定位在区域 F,由此,企业的内生排序反过来增强了区域间的成本差异^[12]。

2. 由对称区位、同质企业到非对称区位、同质企业的演进

为探寻上述两种均衡结果所需的支撑条件,首先假设初始时两区域是对称的,即在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方面是完全等同的,两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同。在此条件下,重新定位意味着在当地市场竞争强烈而在另一个市场竞争微弱。因此,其中一家企业总是能够通过改变区位选择而获得更多利润,尤其是当两企业的产品替代性越强或者两区域的贸易成本越高时,企业改变定位而获取利润的空间越大。换言之,当贸易成本较高或者产品差异化程度有限时,竞争更能促使经济行为分散。

然后,笔者引入两区域间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的差异,从而引入了垄断情况下的两种集聚力。这意味着,如果市场和成本优势足够强大,即使竞争扮演分散力的角色,两企业仍有可能都定位于区域 H。而且,当两区域的贸易成本较低或者两企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此种可能性更大。

3. 由非对称区位、同质企业到非对称区位、异质企业的演进

随后,笔者在区域间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引入企业间的效率差异,从而将模型演进为“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在此情况下,内生比较劣势决定了高成本企业规避低成本企业的竞争^[13]。相应地,低效率的企业 2 会具有很强的动机避免集聚在优势区域 H 所产生的激烈竞争^[8],而选择定位于区域 F,依靠贸易壁垒维持其本地市场份额^[14]。如果扩展至多企业模型,可能会出现高效率企业集聚在具有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优势的 H 区域,低效率企业扩散至相对劣势的 F 区域的现象^[15]。因此,企业异质性成为除竞争之外的另一种分散力,并且该分散力会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降低而增强。需要说明的是,效率差异是从技术维度来衡量企业异质性的,如果通

过产品质量差异来引入企业异质性,可以得到相似的区位选择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间的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同时,企业定位也决定了区域间的非对称性,虽然某经济行为起初的定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是集聚过程一旦开始,空间差异就会形成,因此集聚经济具有自我维持的特征(循环累积因果效应)^②。

(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基础上加入企业异质性,着重分析了微观企业异质性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使得分析问题更加符合实际经济情况。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主要有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OTT(Ottaviano-Tabuchi-Thisse)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和BEJK(Bernard-Eaton-Jensen-Kortum)分析框架。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研究方法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简要介绍模型的一些特点,主要内容见表2。

表2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及特点

分析框架	代表性文献	主要结论	优点或缺陷
D-S	Baldwin 和 Okubo (2006); Baldwin 和 Forslid(2010); Baldwin 和 Okubo(2009); 何雄浪等(2012)	从生产率异质性、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和企业规模等角度,探讨了不同区域的生产率差异、劳动力空间流动和不同规模企业因税收不同而产生的定位选择	缺陷:1.求解复杂,只能用数值模拟方法;2.替代弹性不变的固定加成率降低了模型解释能力
OTT	Melitz 和 Ottaviano (2008); Okubo 等(2008); Okubo(2010); 梁琦等(2012)	从成本差异、市场一体化、市场规模等角度分析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定位的影响;通过加入政府行为对OTT框架进行扩展	优点:1.克服替代弹性不变的缺陷,能够分析产品多样化和市场规模不同等的影响;2.采用准线性二次效用函数,使得内生变量外生化,增强模型解释能力
BEJK	Holmes 等(2010)	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	缺陷:采用的是Bertrand竞争而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采用此方法的文献相对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模的逐步发展和日趋完善,需要更多经验证据支持或者推翻“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测,以丰富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一)企业组织选择与竞争策略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的出现重塑了跨境的区域间贸易模型。“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异质企业的结构选择、空间行为组织及策略选择进行研究。Naghavi 和 Ottaviano 基于一个两国家(南—北)两部门(生产与研发)的内生增长模型,在考虑企业异质性、技术外溢以及境外生产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研究了离岸外包的长期作用与影响,研究表明:外包的可能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的关键参数是中间品供给部门的谈判能力,并且经济增长率与上游部门谈判能力的关系呈倒“U”型。另外,不完全契约情况下外包是否能够增加稳态均衡消费水平取决于企业异质性,例如,当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只有生产力低下的企业较多,生产力较强的企业较少时消费水平才会提高^[16]。

Vogel构建了一个内生性的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产品差异化空间竞争模型,考虑一个基于完全信息的两阶段博弈。研究表明:一方面,由于产品特征或者地理因素存在水平差异,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企业通常可以自己选择差异化产品特质;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更具效率的企业在地理上更加孤立。因此,高效率企业的竞争者只能通过销售与其产品替代率较低的产品才能与其竞争,因而高效企业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以一个圆周代表空间,分布于圆周内的消费者购买何种产品取决于哪个企业(企业异质性体现在边际成本差异上)能够提供最低的经区位调整(考虑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运输成本)后的价格,鉴于企业可以自由地改变产品特质和定位,对于市场中的任意一个企业,其产品定价、市场份额和利润只决定于其自身的边际成本、所有企业的平均边际成本以及市场中企业的数目,而与其临近企业的定价、市场份额和利润无关^[17]。

Syverson 给出了在市场规模和竞争水平不同的区域中存在成本差异的企业的竞争策略：在竞争程度较低、市场密度较小的区域，高成本垄断企业可以在不减少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价格加成水平，以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当区域内竞争激烈、市场密度较大时，企业的价格加成要低于其在竞争程度低且市场密度小的区域的相应水平，同时，企业还要不断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降低定价的利润损失^[18]。

（二）企业异质性与集聚经济

Okubo 和 Tomiura 采用日本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企业生产率在区域之间的分布情况，结果证实地区补贴政策可以吸引企业的进入，促进经济集聚；但采取补贴政策的地区吸引的主要是一些低生产率企业，中心区域具有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地区间生产率差异进一步扩大^[19]。Behrens 和 Duranton 利用美国 2000 年 276 个城市的数据分析了大城市与小城市中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差异，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企业比小城市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并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高技能工人选择大城市，大城市能吸引更多的高效率企业家和企业，或者是因为集聚经济^[20]。Combes 等利用法国城市层面的数据，对法国大小城市的生产率分布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大城市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更高是企业选择效应和集聚经济的结果，前者指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使得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生存，后者指城市越大，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各种相互影响因素越强。他们通过构建一个一般的企业选择模型和一个标准的集聚模型，来判断这两者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城市里的选择效应左截取了生产率分布，更强的集聚经济右移并扩展了生产率分布，即集聚经济的强度因选择效应而被扩大了。最后他们利用法国企业层面数据和分位数方法研究发现空间选择效应不能有效地解释法国企业空间生产率差异，证明了相关结论^[21]。

Holmes 和 Stevens 利用美国 CBP(country business pattern)企业层面数据，在排除某给定单独企业对集聚贡献的情况下，研究该企业规模的期望如何与本地集聚程度产生联系。研究表明，处于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的规模要大于聚集区域外相同产业其他企业的规模。在一些部门，例如制造业，该差异会更加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产业集聚区的企业相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更能够利用成本优势^[22]。

郝寿义和范晓莉在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 FE)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研究贸易自由度、产品种类和生产率不同的企业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利用 1978~2010 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在初始经济封闭的大国，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及产品种类的增加，所占市场份额较大的低(高)生产率企业更易形成空间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从而有利于该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23]。

（三）企业异质性与税收政策应用

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为更好地分析税收政策提供了微观分析的基础。Baldwin 和 Okubo 在同时考虑集聚经济和企业异质性的情况下，分析给定的国际税收体系对不同规模企业定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允许企业异质性的情况下，给定的税收体系对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位选择有内生的不同影响：大公司内生地更可能选择定位在低税收地区，小公司更可能选择定位于高税收地区；同时，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实施不同的税率，这样可以在不引起企业移至其他低税国家的同时增加税收^[24]。

Davies 和 Eckel 在生产率不同的异质性企业假设下建立税收竞争模型，并将企业重置所需的固定成本投入与地区间的劳动者工资差距联系起来，扩展了税收方面的研究。研究表明：税收影响企业分布，进而影响均衡工资、均衡价格和企业数量；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最优税收能够影响收入在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之间的分配，并协调企业数量，有助于避免过多企业进入而导致的市场扭曲^[25]。

（四）企业异质性与补贴政策应用

Okubo 在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不同补贴政策对企业重新定位的影响，并讨论哪种区域补贴政策能为外围区域带来最佳发展效果，实现该地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研究表明与利润成正比的补贴能够吸引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并增加外围地区的福利^[26]。Chor 在融入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一国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而实施的补贴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影响^[27]。

Forslid 和 Okubo 在三个规模不同国家的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下,比较了贸易成本和重置成本降低对三个国家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成本和重置成本降低使得规模最大国家的企业增加,福利也增加。同时,当重置成本降低时,中间规模国家的产业集聚;当贸易成本降低时,中间规模国家的产业减少。而这两种措施均使得最小规模国家的产业减少。此外,贸易成本降低使得中间规模和最小规模国家的福利均增加;重置成本降低使得中间规模国家的福利增加,使得最小规模国家的福利减少。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措施对不同国家产业和福利的影响不同,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时,政策措施的选取非常重要^[28]。

中国学者梁琦等在 Okubo 等模型基础上加入政府行为,探讨了中央政府与相对落后地区政府为缩小地区经济差异而对小市场区域企业^⑤采取补贴政策的微观效应。文章分析了可变成本补贴和重新定位补贴分别对地区生产率差异和经济差距的影响,并对比两种补贴的效果。研究表明,一方面随着小市场区域补贴(不论是可变成本补贴还是重新定位成本补贴)水平的提高,小市场区域首先吸引高成本企业进入,加剧区域间生产率的差异;当补贴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吸引低成本企业进入,进而缩小区域生产率差异,但这两种情形均可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另一方面,缩小地区差距和生产率差异所需的补贴水平,与贸易成本和地区之间市场规模的差异程度正相关。这些结论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地区生产率差异、经济差距扩大及区域政策不理想的原因,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29]。

(五)劳动者异质性与城市经济

Behrens 和 Robert-Nicoud 采用美国 2006 年 500 个大都市和居住区的统计数据,将企业家管理才能引入到垂直城市差异的微观分析中,首次在同一模型中同时考察集聚效应、选择效应以及城市的两极分化现象,通过实证解析了劳动者异质性、集聚、城市化和收入不均衡之间的关系,并细致地分析了城市何时出现、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以及城市之间如何通过贸易渠道相互影响等问题。研究表明:大城市虽然具备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但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小城镇并呈现出两极化的局面,并且大城市中心的发展阻碍周边城市的发展;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新城市的出现和原城市的增长^[11]。Behrens 等采用美国 2000 年 276 个大都市的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 0.082,即城市人口增加一倍,人均收入增加 8.2%,但在控制了人才归类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后,该系数下降到 4.6%。同时,个体才能的分布与城市规模分布相结合,为城市规模分布近似帕累托最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静态解释。更进一步,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小城市^[20]。

Venables 研究了城市中异质性劳动者与异质性企业的匹配机制,将现存的市场失灵(信息非对称)与微观异质性相结合,为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提供了示例。城市的生产率较高部分是由于城市环境促进了自我选择机制,如果工人对于与他们配合与合作的工人的能力没有掌握完全信息,并且该配合发生在城市内部,那么高能力工人会选择生活和工作在成本较高的城市,而这种自我选择反过来提高了城市中的配合质量。并且该机制可能会因为城市信息网络的完善而得以强化,结果使得拥有高比例高能力工人的城市比其他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率^[30]。

刘海洋等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 2003~2009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城市间工资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效应、人才归类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显著地影响了工资水平,而新经济地理学由于忽略了人才归类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而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同时,从动态角度看,产业集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持续增强,意味着城市间工资差异将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但人才归类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的递减可能会弱化这一影响^[31]。

五、“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未来研究方向

新经济地理学专注于研究集聚经济的自我强化机制,应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收益递增、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关系等来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但是,新经济地理学是建立在同质企业假定的基

础之上,忽视了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对经验研究以及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融合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更加贴近现实因而更具解释力。本文介绍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阐述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并对“新”新经济地理学经验检验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中发掘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是拓展研究视角。鉴于异质性的表现形式不断扩展和多样化,未来不仅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和劳动者异质性切入,而且还可以基于企业规模,并结合贸易自由化和相关政策来进行分析,从多角度分析微观层面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将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异质性与劳动者异质性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Behrens 等在企业和企业家同时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分析了大城市具有更高的单位资本产出的原因^[20],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是完善理论框架和模型方法。未来关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和模型方法的研究会逐步多元化,通过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拓展,并应用多种分析工具,从而创建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模型,最终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梁琦等在 OTT 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行为,从理论上分析政府补贴对地区生产率和经济差距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29]。

三是促进“新”新经济地理学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融合。未来应进一步促进“新”新经济地理学与其他相关理论的融合,并把“新”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扩展到开放经济中。Chen 和 Moore 基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框架分析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投资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的影响^[32],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扩展应用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

对于中国而言,有关“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29][31]}。然而,正如杨开忠教授所说,现在的中国不仅发生着世界上最大规模、最迅速的城市化、移民化和一体化,而且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的情况,经历着向知识大增长和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经济活动的区位分布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持久的、趋势性的变化,这为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也对经济地理学研究提出了重大需求。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

注释:

①这里假设的区域间不平衡,即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差异是内生决定于某区域内(在此指区域 H)的经济行为,并非外生给定或者由第一特征决定。

②集聚经济自我维持的特征,即累积循环因果效应。这主要是通过需求关联(又称后向联系)和成本关联(又称前向联系)实现,前者增加区域间市场规模的非对称性,后者增加区域间生产成本的非对称性。

③文章主要讨论对小市场区域企业采取补贴政策,是因为文中首先证明了低成本企业从大市场迁往小市场时的收益损失总是高于高成本企业,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高、低成本企业都将定位在大市场,这必将显著增加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故研究对小区域企业的补贴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参考文献:

- [1]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2] 梁琦. 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J]. 经济学(季刊), 2005,(4):1067—1086.
- [3] Krugman, P.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1):1—7.
- [4] 梁琦,黄卓. 空间经济学在中国[J]. 经济学(季刊),2012,(4):61—66.
- [5] 安虎森. 空间经济学原理[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 [6]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1695—1725.
- [7] Bernard, A. B. , Eaton, J. ,Jensen, J. B. ,Kortum, S.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1268—1290.
- [8] Baldwin, R. ,Okubo, T.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3):323—346.

- [9] Okubo, T.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Z]. Discussion Paper, 2010.
- [10] Ottaviano, G. I. P.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231—240.
- [11] Behrens, K. , Robert-Nicoud, 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Cities: Agglomeration, Selection, and Polarisation [Z].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8.
- [12] Bernard, A. , Redding, S. , Schott, P.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1): 31—66.
- [13] Helpman, E. , Melitz, M. J. , Yeaple, S. R.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1): 300—316.
- [14] Asplund, M. , Nocke, V. Firm Turnover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2): 295—327.
- [15] Duranton, G. , Overman, H. G. Testing for Localization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5, 72(4): 1077—1106.
- [16] Naghavi, A. , Ottaviano, G. I. P. Firm Heterogeneity, Contract Enforcement and the Industry Dynamics of Offshoring[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11(4): 629—653.
- [17] Vogel, J. Spatial Competi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16 (3): 423—466.
- [18] Syverson, C. Price, Spatial Competition, Heterogeneous Producers: An Empirical Test[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7, 55(2): 197—222.
- [19] Okubo, T. , Tomiura, E. Industrial Relocation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Plants Sorted by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Z].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Kobe University, 2010.
- [20] Behrens, K. , Duranton, G. , Robert-Nicoud, F. Productive Cities: Sorting, Selection and Agglomeration[Z].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10.
- [21] Combes, P. , Duranton, G. , Gobillon, L. , Puga, D.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Z].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10.
- [22] Holmes, T. , Stevens, J.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Scal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4): 682—690.
- [23] 郝寿义,范晓莉.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空间集聚——探寻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7):101—108.
- [24] Baldwin, R. , Okubo, T.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11(4): 741—764.
- [25] Davies, R. B. , Eckel, C. Tax Competition for Heterogeneous Firms with Endogenous Entry[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0, 2(1): 77—102.
- [26] Okubo, T. Anti-agglomeration Subsidie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Z]. RIEB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1.
- [27] Chor, D. Subsidies for FDI: Implications from a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l Economics, 2009, 78(1): 113—125.
- [28] Forslid, R. , Okuto, T.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untries of Intermediate Size: An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in a Multi-region Framework[Z].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0.
- [29]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一个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2):16—25.
- [30] Venables, A. Productivity in Cities: Self-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1 (2): 241—251.
- [31] 刘海洋,马靖,宋巧.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工资差异:原因及趋势[J].中国软科学,2012,(5):93—102.
- [32] Chen, M. , Moore, M. O. Location Decision of Heterogeneous Multinational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0(2): 188—199.

(责任编辑:易会文)